

知詩者的多重身分：《列朝詩集》與 《明詩綜》的吳中傾向與對史傳文學的影響

王達甫*

摘 要

明清兩代承革層面諸多，但同時影響詩學與史傳，並牽涉文字記憶體系者，當推詩集編纂的浪潮。浪尖代表人物之一的錢謙益(1582-1664)首將「以詩繫人，以人繫傳」此概念操作於其一朝詩選：《列朝詩集》中，該作不只立下形式，更逐層影響與之對話者。如，朱彝尊(1629-1709)之《明詩綜》、各地方志之人物傳，乃至其後的地方詩集。本文由《列朝詩集》、《明詩綜》兩部大作為主要切入，由兩作詩、史互繫所描摹的人物，組構錢、朱二人對詩壇認同的價值，更討論二人於編纂親近的地方人物時，如何處理己身也是地方文化一員的斷面。即便是「知詩者」仍是「地方人」，多重身分與人情幽微，反倒成為尚未探究的模糊空間。是以，研究次序上將由吳中人物被兩作取用的佔比統計展開分析，重新檢視此形式在兩作中的具體效果，透看編纂者的取用傾向，也重審地方史料如何承繼、交互，進而探問選編者替「地方」敘述帶來的方向。

關鍵字：《列朝詩集》、《明詩綜》、吳中、錢謙益、朱彝尊

投稿日期：2020/05/31；接受日期：2020/11/06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感謝審查委員的意見，讓我有機會挑戰陌生的研究方式，也謝謝編輯室的用心，使本文更加完善。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Collectors: The Wu Orientation and Influences on History-Biography Literature of *Liechaoshi Ji* and *Mingshi Zong*

Da-Fu Wang*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diversity, literary inheritance, and reformati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so affected poetry and history-biography, and the rise of poem collections is what affected the text recording system. A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at that time, QianQianyi (1582-1664) was the first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linking poetry to people and people to biography” to his dynasty-based *Liechaoshi Ji* (列朝詩集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he Dynasty). Besides setting out a new genre, the Collection has influenced those discoursing with it at all levels, such as *Mingshi Zong* (明詩綜 Anthology of Ming Poetry) by Zhu Yizun (1629-1709), biographies in local chronicles, and local poetry collections after hi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Antholog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value of Qian and Zhu in the poetry world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s depicted in the poems and history-biographies in both work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hey handle local cultural influences when compiling works of people from the same native place who are closed to them. Despite the fact that “only insiders know”,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friendship influences have become an unexplored grey zone. Hence, the study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poets from Wu (Jiangsu) selected by both authors to re-examine the actual effects of this genre in both works. Through the orientation of poem selection of both compilers, the inheritance and interaction of local history materials are reviewed to investigate the new directions that were brought to the “local area” by compilers.

Keywords: *Liechaoshi Ji* (列朝詩集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he Dynasty), *Mingshi Zong* (明詩綜 Anthology of Ming Poetry), Wu (Jiangsu), QianQianyi, Zhu Yizun

Submission: 2020/05/31 ; **Acceptance:** 2020/11/06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壹、前言

明、清兩代詩壇的建構與承繼間，《列朝詩集》與《明詩綜》¹兩部以有明一朝之全國詩人為範疇的著作，不啻為清初詩選之代表，更是詩選入清後「以詩繫人，以人繫傳」形式上的濫觴。²且，此形式帶來的史傳和文藝所揉雜的鬆動，一定程度替地方意識留置了空間，亦影響後世史傳的書寫策略。《列朝詩集》與《明詩綜》都可謂詩壇上一時話語權柄者，身處「詩壇」感知下的產物，當他們以「詩、史互繫」³的特殊形式逐個描摹人物時，無形中便留下可供後世想像詩人群體的基礎，也即個體——群體——地方，對特定時空下群體觀察之可能。是以，本文定題以選詩者本身所具之多重身分出發，探討清初詩、人並纂的形式反應的地域傾向與後世史傳的取用。

本文會另外考量「地域」，導因晚明以降的詩壇要角多有博眾附和以佔據壇坫的傾向，假設此意識影響於詩集編纂，那「地域認同」與「風格」便具重要串接地位。地方傾向或地域自覺雖非編纂者最直接的意圖，可流風如此便有一探的價值。進而可問，是否導致地方在各種選集上產生更多地域認同管道仍未可知。若再進一步由晚明至清初觀看，亦可再探清初派別情勢高漲的外圍因素。⁴一般而言，習文學詩者一面感受其生養、成長地方之文風特質，一面回應外部流風的變動，下筆隨年歲際遇而變是很正常的過程，其初始感受的「地方小傳統」往往是其最初的立基，名滿天下的鄉前輩則是主要對話對象，⁵本文以此概念，希望討論詩集、史傳編纂者可能受到的影響管道。以此小傳統推論，受到錢謙益所引入的這項形式影響最深地域，當推錢、朱二人學養背景均有深刻牽涉的吳中地區，⁶但若純以文化指涉吳中又難以劃分史傳範疇，故本

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本文所使用之《列朝詩集》與《明詩綜》皆出於此二版本。

² 「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之概念源於元好問(1190-1257)《中州集》，明末清初人錢謙益(1582-1664)是入清後首將此形式用於其國朝詩選：《列朝詩集》上的引入者，概念、形式如此，但無論《中州集》還是《列朝詩集》都沒有直接將「以詩繫人，以人繫傳」此說直接行於文字，直至朱彝尊(1629-1709)之《明詩綜》才將此形成中的概念具體化。史哲文：《安徽清詩總集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7年)，頁38-41。李清華亦認同入清後詩選集的形式體例有此變遷，但行文上直接將《中州集》與《明詩綜》為承繼，不特提《列朝詩集》於此脈絡中的位置。李氏認為，地域詩話確實與此總集形式有著密切關聯。李清華：《清代地域詩話研究》(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6年)，頁127-128、130-132。綜上兩說，本文以為李清華之說法，可能過於輕信《四庫》對於錢氏的詆毀與對朱氏的褒揚，是否無承繼之關係尚待討論。

³ 本文「史」之指涉，側重於《列朝詩集》、《明詩綜》與方志中的個人傳記層面，也即「生命史」在結合「詩作編纂」的載錄成果探究，並非純以國別史或地方史的角度視之，期待由個人生命史背側種書寫的面向，追探編纂記載者的價值與策略。

⁴ 明代晚期詩歌品評權力的下移，間接塑造百家爭鳴群類派分之情勢，此形勢仍然影響清代初期，前代留下的類聚以造聲勢的慣習論法，將人以群類，是以有將創作傾向歸納的「神韻」、「性靈」等派說法，也有以地域歸納的「雲間」、「西泠」、「虞山」的劃歸方式。傅璇琮、蔣寅總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0；清代詩壇概述，傅璇琮、蔣寅總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清代卷》，頁38-39。

⁵ 較之全國性「風尚」的大傳統，對詩人影響最為直接的反而是故鄉(或久待之區域)的文學前輩遺留下來的傳統。若創作的本質是走出自我獨特表徵的道路，小傳統便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第一道關卡。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40。

⁶ 明清文人對於「吳中」在地域上的稱呼具有歷史上周代吳國的文化承繼，也有廣義的泛江南文化概念。

文追加錢謙益於方志上的最終歸屬：「蘇州」下轄的行政劃分，兼夾部分雖非蘇州行政，但仍被《列朝詩集》、《明詩綜》視為吳中要區的地方。錢謙益與朱彝尊雖均為吳中文人出身，但嘉興出身的朱彝尊在撰述蘇州地區文人時，便與錢謙益有不小的落差，是以，本文將以錢為主、朱為反面對照的方式討論兩作在人物史傳與詩作結合操作的傾向差異。以下行文中，詩選文學面行文以「吳中」，但在檢討史傳層面的影響時，則轉以人物於方志本身所屬的行政區塊強化檢視。

既關乎「地方」，便有相當程度牽涉於「人情」，而情感則奠基於記憶。為求更聚焦於錢、朱背後的人情網絡，本文在時間區段上聚焦於錢謙益活躍之晚明萬曆以後之時期，亦即《列朝詩集·丁集》所載之範疇。⁷考量到朱彝尊是崇禎年間出生，時期相距仍在耆老可資之範疇，故亦以《明詩綜》卷 52 萬曆後之人物為疊合統計區段，儘量求取錢、朱二人於明朝活躍或仍有鮮明群體印象之時期，進行人物、籍貫於「吳中人物」之傾向統計，詳細統計及分析請參「貳、《列朝詩集》與《明詩綜》萬曆後之統計」篇章中之討論。

錢、朱二人的理念、立場之攻堅已有不少學術積累，而本文探詢的核心並非純在「詩學之異」，而是探究兩名品評者在重建全國性詩壇想像時，因此種詩、傳互繫形式而產生的詮釋空間之具體，及可能的解讀面向。這些品評除了表徵選詩者的多重性外，更替後之為史傳者產生多層面的影響。但，目前在地域詩選的研究向度中，⁸並沒有針對選詩、留傳的編纂形式與地域承繼連結提出具體觀察，是以本文希望透過萬曆後被圈選出來的吳中人物，這群下築清代、乃至於第一批接著入清後的詩壇基底，在知詩者眼中的面貌，並檢視與後之史傳的承繼狀態，析理其脈絡變化。

雖是文化範疇，但「吳」也跟蘇州首縣「吳縣」有所牽涉，可見行政上的影響仍在其中形變。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 16-18。文化觀念上的地域範疇，也因為訴說對象的時期而有所不同，大體而言不一定侷限吳中出身人，而是文學事件發生的地點，但其本身具強調文化傳承的意含。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86-88、91-92。本文指涉之吳中將於第貳節進一步定義。

⁷ 據《錢謙益年譜》錢開始嶄露頭角之跡象，約莫於成為府學弟子，並開始受到時人稱讚的萬曆 29 年後，更明確之跡象則是萬曆 33 年開始與嘉定人物來往。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年），頁 15、17-19。故，本文以為，自錢謙益科場取得功名，並開始活躍於文壇與四方豪士來往的萬曆後為聚焦區段是效率較高之作法。

⁸ 地域詩話、詩選兩大項類的前人研究，或單從地域詩話出發，或僅由地域詩選為進路，雖能道其地域詩選特徵並對詩選者的隱微思量多有所論，但多半難以對生成的環境與機制提出解釋。尹玲玲：《清人選明詩總集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2年），頁 66-67、86-87、李清華：《清代地域詩話研究》，頁 14-16。雖有學者提出此類詩選者、文學巨擘等，通常都和其背後的地方群體有著深厚的連結現象，但具體關係與影響仍待學界爬梳。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66-68。在相關研究中，史哲文在研究地域與詩學間的關係時，即結合了行政區塊、宗族等屬於地方意識的範疇來檢視發端其中的詩選，並提出記憶需要媒介作為載體，以此特為看重詩選的說法。策路與本文所見略同，但連研究安徽地域詩學的史氏都承認錢謙益、朱彝尊的源流重要性，就更不能不重新檢視兩作對吳中地區文、史編纂上的影響了。史哲文：《安徽清詩總集研究》，頁 34-35、38。另有學者對於地域詩學傳統的形成，是直接以地方詩話編選興盛的「閩地」為討論對象，認為閩籍的臺閣館臣是對地方造成直接影響傳統的一環，其立論點正與本文相仿，但詩的傳統與形成顯然各地有異，本文不僅從詩學的編纂觀看明清詩人地方意識，更從錢、朱二人詩選編纂迴向史傳傳承，觀察屬於吳中的特質。陳廣宏：《閩詩傳統的形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 102-104。

至此，研究進路如下：第一步，以特定之時間：「萬曆以後」、空間：吳中概念與「蘇州地區」為聚焦，統計分析錢、朱二人的吳中傾向。第二步，重新檢視詩、史互繫形式於此二作展現的特質，並與方志對比透視形式上的鬆動。第三步，透過兩作談論的吳中人物為聚焦，觀察蘇州文人的形貌，並進而探討選編者替「地方」敘述帶來的方向。以此轉入第四步，將前節中的視域差異進行討論，再次觀察兩人在選評者、詩人、地方人……等複雜而多重的身分產生的效果，最後，由此引導出詩、史互繫形成的地方編纂傳統。

貳、《列朝詩集》與《明詩綜》萬曆後之統計

一、時間、空間與統計區間界定

錢、朱二人之詩選關注面向是明朝全代之詩人，本文基於兩人對「吳中」地方編纂的影響假設採取廣義文化面向上的吳中蘇州範疇，亦即以蘇州府為中心向外略擴鄰近地區，空間上的區劃基礎參考嚴明於〈吳文化的基本界定〉鎖圈定之範疇，並略行修訂：

吳文化區域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長江和錢塘江三角洲地區。

北界為南京、揚州、泰州、如皋、如東一線；

西南界為南京、溧陽、長興、德清、杭州一斜線；

南界為杭州、蕭山、紹興、余姚、寧波一線；

東界從寧波經上海到啟東，基本上是一塊朝著西北方向傾斜的菱形地理區域。⁹

嚴明以水稻農耕文化的種植習慣區分長江下游出海口、錢塘江沖積平原等地為吳文化區，並指出此區水路方便疏運，加之環太湖地區運輸便利，自然容易成為經濟、文化的基礎，形成重要人口密集區。循此認知結合《列朝詩集》、《明詩綜》慣習使用的具體地名，粗以如下地區歸整為本文「吳中」概念地區（由北而南）：江陰、金壇、常熟、無錫、太倉、崑山、嘉定、長洲、吳縣（會稽）、上海（松江）、吳江、嘉興、錢塘……，等 13 個地區作為空間範疇，其中部分地區如錢塘超出嚴明之指涉範疇，但畢竟是文化感知地域，本文仍以錢、朱二人的感知為依略行調整，進而將《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區分為「吳中人」與「非吳中人」。

至於時間區段，考量到傳記關乎人事，而錢謙益撰寫時便常以細節為其敘述資本之傾向，統計聚焦於錢謙益開始展露頭角，活躍之晚明萬曆以後之時期，亦即《列朝詩集·丁集》所載之範疇。至於崇禎年間出生的朱彝尊便時有與前朝故老諮詢或接觸，故，亦以《明詩綜》卷 52 萬曆後之人物為疊合統計區段，儘量求取錢、朱二人於明朝活躍或仍有鮮明群體印象之時期，進行人物、籍貫於「吳中人物」之傾向統計。但兩作除了處理其認知下的文壇人物，另有特殊道德意識下的女性詩人、方外僧道，或國際使節往來詩作的《列朝詩集·閩集》與《明詩綜》卷 82 至卷 98 區段，因質性特殊不宜混談亦不列入統計。

⁹ 嚴明：〈吳文化的基本界定〉，《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91 年，頁 102。

二、吳中人數與地區占比觀察

人數占比非編纂者刻意匠心之所在，卻特能點出取材過程對區域的熟悉度與大方向上的傾向，這種無意識下的表徵，有助於找出編纂者下意識關照之地區，進而摸索聚焦區域。以下將就兩作之吳中與非吳中人物占比起手，觀看人物與區域配比。

(一)《列朝詩集》概況

首先是《列朝詩集》，其書收錄之詩人總數為 1199 位詩人，¹⁰萬曆以後之詩人總計 262 人，於全作的佔比約 22%，其中「吳中人」總計：77 人；非吳中人：181 人；籍貫資訊不足：4 人，吳中人約莫佔比 30%。分佈地區及人數如下表：

地名	江陰	金壇	常熟	無錫 (崇安)	太倉	崑山	嘉定	長洲	吳縣 (會稽、 吳門、 姑蘇)	上海 (松江、 雲間)	吳江	嘉興	錢塘
人數	3	4	12	6	2	7	6	7	21	3	4	0	2
占比	3.8	5.1	15.5	7.7	2.5	9	7.7	9	27	3.8	5.1	0	2.5

自上表可知錢氏最大比重者為吳縣地區，除行文中直接書以「吳人」的具體指涉外，不少人物之籍貫僅以模糊的「吳門」或古地名之「會稽」、「姑蘇」指稱，故此感覺範疇相對較模糊，是否導因於錢謙益晚年取材上有支絀之困仍待考查，但吳縣為蘇州成立較早之縣治，可想見比重較高之理，但僅次於吳縣者便是錢謙益出身的「常熟縣」，除此之外，受到朱彝尊重視的嘉興地區則未具體指稱過。

(二)《明詩綜》概況

朱彝尊於《靜志居詩話·序》中提及，整部詩選集所收錄者凡 3400 餘家，¹¹而據本文統計萬曆以後活躍之詩人總計 1115 人，幾佔三分之一，而其中「吳中人」計：343 人；非吳中人計：770 人；籍貫資訊不足：2 人，吳中人占比約莫 30%，比重不容小覷。下為吳中人分佈地區及人數配比表：

地名	江陰	金壇	常熟	無錫 (崇安)	太倉	崑山	嘉定	長洲	吳縣 (會稽、 吳門、 姑蘇)	上海 (松江、 雲間)	吳江	嘉興	錢塘
人數	2	0	16	18	17	22	23	43	45	37	46	64	10
占比	0.5	0	4.6	5.2	4.9	6.4	6.7	12.5	13	10.7	13.4	18.6	2.9

自上表觀察朱彝尊取人之比重，占比最高地區即為朱氏出身的嘉興地區，其次為吳江，次之為吳縣，偏重吳中南方之傾向較錢謙益顯著不少，兩造間的差異再次展現詩集編纂更易受到

¹⁰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鑰》第 2 期 2004 年 7 月），頁 13。

¹¹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儒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

地方小傳統的影響，但令人意外的是，無論是錢謙益或朱彝尊，兩人對各自熟稔地區的人物比重均明顯偏高，朱氏反較錢氏傾向明顯，至於實際傳記上的敘述操作則有待下節分析。

參、語調差異

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向來緊密，《列朝詩集》與《明詩綜》所強調的詩、史的結合便與純以詩選為主導的作品不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兩作對「史」的想像，及一般史料往昔不重視，卻受兩作看重的部分，以此梳理鬆動出來的灰色空間具體樹立起何種成果與意識。

一、文在布衣：談論何允泓的方式

一般史傳系統，往往重視具功名、德性彰顯者，詩選則重視「文藝」特質明顯者，但在詩、史互繫的形式下或許因為可詮釋空間的彈性變大，即便面對同樣選錄之人，錢、朱語調卻大不相同。以何允泓(1607-?)¹²為例，在錢氏之前此人沒沒無聞，但在錢謙益墓誌、詩選兩次書寫後，朱彝尊、地方志及其他志書也開始載錄，實有利於觀察錢謙益介入下的人物記憶之轉變。《列朝詩集·何秀才允泓附見 從子大成》中的條目如下：

允泓，字季穆，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為詩歌古文，累數萬言。長而學問日以成就，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鄭、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季穆攬摭解剝，窮極指要。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好談三吳水利，訪問三江古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反。嘗遇盜奪，襆被忍凍以歸，家人不知其何所為也。……生平悠悠忽忽，不飾容止。衣垢不澣，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皆搖手避去。¹³

何允泓這樣一名厭惡科舉，早早自溺於典籍的人物於詩壇上並不乏見，錢氏卻給予正面評價並著稱其鑽研面向廣袤，地理、官制、河川水利與地方稅制均有研究，甚且不時實地考察即便遭遇盜匪威脅也在所不惜。這樣名窮究於知識鑽研，難得周圍認同的狂生，錢謙益為何願費細節去記述？對此錢氏別有意識地自我解釋：

……余之誌季穆云爾：季穆為詩，才力橫驚，馳騁李、何、王、李之間，欲與之上下。久而學殖日富，歷覽宋、元名家之作，悵然知俗學之非，思進而求之古人，而年已不待矣。……如季穆抑塞磊落，胸有武庫，要為天下所共歎息。其詩論亡宋勝國遺事，援古論今，菀結沈痛，由今日思之，尤可為腹悲也。余錄季穆詩，為千古存此一人，豈惜小子輩哉！……¹⁴

¹² 何允泓，……淮府長史何鈞季子、何鐸姪子，何氏一族為明末清初藏書家族，甚受蘇州鐵琴銅劍樓瞿氏看重。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頁62、64。

¹³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5535-5544。

¹⁴ 同前註。

綜上何氏被稱許的特質為：詩方面才氣綜橫、積累深厚，再論其援古人詩，論今憂國。錢自清這麼做，是為何允泓不為環境所迫的堅持給打動。此動機在錢早前替何氏寫墓誌時也有所敘述，¹⁵記憶銘刻的過程中，錢所謂：「豈惜小子輩哉！」所顯露的不捨，反疊合他原初在墓誌銘原文之核心：「存詩也存人」，藉由墓誌銘後段可進一步理解錢的意識與企圖：

……崇禎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三歲，實兄事余。……今季穆既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間，俯仰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於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可以並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銘曰：余哭季穆，舟次界首。有詩千言，灑淚漬酒。胸懷鬱盤，鬚眉抖擻。此詩可傳，銘於何有？嗚呼！詩之與銘，孰傳不傳？身後之名，亦有命焉。……¹⁶

墓誌銘前半段大致與《列朝詩集》中的人物傳相仿，但後段藉由錢與何氏二人的回憶，忽然將何允泓與錢己身關係特為強調。同時將兩人之關係比為陳同甫(陳亮，1143-1194)、王道甫(1134-?)¹⁷等以理念、以兄弟相稱的二人。陳同甫與王道甫二人在聲名上相繫，甚至在墓誌之上能相互並誌，被後世同為記憶，錢謙益並感觸道：「今季穆既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將痛惜友朋，與其身之境況隱性連結於自比自傷。這牽繫濃厚人情的鄉里記憶，是《列朝詩集》觸及吳人時最顯著的特質，同時也暗示《列朝詩集》不同於追求世俗功名的特殊價值觀。

反觀朱彝尊論此人只一句：「何允泓，字季穆，常熟縣學生。孝穆詩頗嵌崟，不沿時習。」¹⁸定義何的社會身分為縣學生，詩作風格特殊引目的地方是：「不沿時習」。此四字較之錢謙益可謂精簡但仍算正面，值得再探的是，朱彝尊撰寫《明詩綜》時所面對的前人除錢謙益以外還有哪些紀錄，致使他決定如此記載？何氏在《明詩綜》或《靜志居詩話》之前最早在方志中具傳記記錄者，為康熙年間由錢謙益族孫錢陸燦(1612-1698)所纂的《常熟縣志·何允泓》：

何允泓，字季穆，年十四、五時即厭薄程文，熟爛之習。讀書為詩歌、古文累數萬言。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鄭、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允泓攬摭解剝，窮極指要，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兵農，經緯畢貫。好談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錢宗伯謙益誌其墓，

¹⁵ 何允泓之子另求集序於吳梅村(1609-1671)，然，吳梅村對何氏的記載並不特強調詩學成就，反轉由論人在各方通才足堪國用，卻因受限不擅科場而成國家之遺珠來抒發，一者沒有為後之方志取材，二者，與本文論述主旨疊合不多，故未納入討論範疇。(清)吳偉業撰；(清)顧師軾附錄：《梅村家藏稿》，景武進董氏新刊本，卷第二十七。

¹⁶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何季穆墓誌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375-1376。

¹⁷ 《宋史·列傳》：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149。

¹⁸ (清)朱彝尊：《明詩綜》，頁3286。

比之宋王道甫。¹⁹

在錢陸燦的敘述下，何允泓讀書的契機雖是舉業卻走出自己的道路。明清舉子業的考試內容已然與詩歌沒有直接關係，文人在讀書求學的道路上很可能在一次次的挫折中，發展不同於科舉價值的價值認同。²⁰以何允泓來說，他讀書為求接近古人，且是名貼近山川水利的研究者，錢陸燦對這名沒有具體功名、沒有特殊詩名的讀書人會有印象的原因，正是其族中長輩錢謙益對其墓誌的高度評價——將此人比為宋朝主戰北返的愛國份子——王自中(1140-1199)。錢陸燦整體繼承了錢謙益的敘述，並特為強調比附於王的性質，應可從王自中因性情耿直，並不因挫折而妥協的堅定意志上給予肯定，換句話說，同樣是回歸對抗整體環境上的精神認可。

正因何氏親近古人「讀古人書」、「思古人意」，進一步揭露朱彝尊選詩的操作。何氏在《明詩綜》中被選的作品都是他讀古人的作品：〈讀岳忠武傳二首〉、〈讀元遺山集〉、〈讀張光弼集〉，在此 4 首作品中，〈讀元遺山集〉、〈讀張光弼集〉為最初在《靜志居詩話》中被注意到的作品，但隨後具體呈現在《明詩綜》中時，則是以〈讀岳忠武傳二首〉為掛帥。無論是〈讀岳忠武傳二首〉還是〈讀元遺山集〉，整體觀之都是強調在讀古人書、史方面的特質上，強化何氏的原初定位。

即便相似，朱彝尊卻刻意刪去厭棄時文、鑽研地理、不容於鄉里的各種細節，《明詩綜》中的何允泓僅是名皓首窮經，鑽研歷史長河的書生，傳記上可謂大幅度地去除與鄉里環境上的連接。若再檢視錢謙益《列朝詩集》中何允泓條目下計 24 首(含組詩 5 組)的選詩，便能發現與朱彝尊呈顯的創作特質大相逕庭。為免冗贅，以領首詩作〈詠懷吳中先哲贈別受之孝廉七章並序〉之序為主要討論，並略論部分詩作主題：

今天下需文武才甚急，而中外人材何今昔遼絕也。嘗上溯憲、孝朝，下及永陵之季，元老長德，接武殿閣，春坊夕垣，各循厥職。而在外者，或慷慨出塞，或拮據治渠，用能宣力帝室，洪濟時艱。予不佞，志不出閭巷，何知天下士。即吾吳二百年來，鄉先生錯列琬琰，代不乏人，視今日何如也，每與受之扼掎。盛衰之際，不勝昔人九京之嘆。己酉之秋，受之偕計吏上公車，爰有銓述，納諸篋笥，蓋贈處之義備焉。²¹

不談讀書、不講心得，錢謙益所摘選的何允泓作品登場便是天下朝政。何允泓送別友人，將之比於地方前輩人才，而所謂的人才就是錢氏與何氏的故鄉：「吾吳」，稱述之間自豪感油然而，傳承意義濃厚。其所謂吳中先哲者誰？徐階(松江府華亭縣，1503-1583)、王鏊(吳縣，1450-1524)……，等 7 人。這段序文與隨後引導而出的組詩，與墓誌銘提及的人物彼此增益，成為被後世記憶的符碼，包括錢氏自己也在此連結中。²²何允泓這類非官、非藝文的人物受到

¹⁹ (清)高士鶴修；錢陸燦纂：《常熟縣志·文苑傳》26 卷(康熙)卷之 20。清康熙 26 年(1687)刻本，頁 42b-43a。

²⁰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頁 6-7。

²¹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何季穆墓誌銘》，頁 5536-5537。

²² 宇文所安在回憶類型的文學敘述中歸納，回憶總是由積聚開始，但同時也暗示著散佚的起始，在為死

編纂者網羅的現象，反映晚明「文在布衣」的觀念。羅時進認為，這樣的群類雖在權力、社經地位上處於相對外圍的位置，但在晚明以降已別具影響力，就其本質，就是因為一無所有，而更能率性表述自我。²³可今日能被後世研究者關注到這些沒有實績，也並不服膺當時主流價值觀的外緣、邊緣者的存在，部分原因即是本文關注的「史傳取用」這套別具彈性形式的最大優勢，也留下更多情感的鬆動空隙，是以能導入連結詩人的出身與他生養環境間的關照，這和地方性的呈顯不無關係。

二、田藝衡的塑造與忽視

若將目光放諸沒有顯著功名的文人群體如何被錢、朱二人記載，便能在稍脫社會主流價值的細微空間中窺探二人對「詩壇」的價值塑造，更能發掘兩人的敘述方式有明確的傾向區別，錢謙益有其想像中的詩壇價值觀，這套價值觀有時是極其浪漫的；朱彝尊則有意識地壓縮這樣的層面，更傾向於強調「忠義」的道德價值。除上文之「布衣」何允泓，以下再論田廣文(生卒年不詳)之例亦是名具敘述差異的案例《列朝詩集·田廣文藝衡》：

田廣文藝衡九首

藝衡，字子秬，錢塘人。學憲叔禾之子也。十歲從其父過采石，賦詩：「白玉樓成招太白，青山相對憶青蓮。寥寥采石江頭月，曾照仙人宮錦船。」性放曠不羈，好酒任俠，善為南曲小令。晚歲以貢為新安博士，罷歸。常衣絳衣，挾二鬟，遊湖上，逢好友則令小鬟進酒，促膝談謔。時時挾內人遍遊諸山，偶日暮，不得巾車，覓得一驢，與內人共跨入城。有《留青日札》在小說家。²⁴

田藝衡之父田汝成(1503-1557)不僅是名中央官員，更是歸隱後撰述《西湖遊覽志》的出版名人，²⁵而在錢謙益的筆下田氏大有乃父之風，十歲所賦之詩以李白播於世間的傳說為主題，暗示創作者在質性上就嚮往這樣的瀟灑人物，是以下帶田藝衡的好酒任俠，以與其幼年詩作描摹對象形成呼應，如此安排後，才稍稍帶出晚年以貢生補博士弟子員之事，並不把多年蹉跎舉業無成之事當作此人的核心價值，撰述重心反在其「罷歸」後的描寫之上。田氏既不因此萎靡更沒有頹志，反似其父恣意山水，透過與丫鬟、妻子出遊的日常描寫也能感受到他的適性，此人傳世之作甚不是詩集。是以明顯可感受到錢謙益企圖塑造的文藝價值既有別於舉業價值，更甚者，不以詩藝為專地操作《列朝詩集》，載錄的九首作品之主題：〈山中〉、〈遊三茅山訪鄭煉師〉、〈夜投禪院〉、〈雨中感懷寄諸故人〉等作夾山水與個人感懷，〈塞下曲〉有邊塞主題性，〈戎

去的人寫下記憶的那刻，書寫者也埋下同被記憶的希望。(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追憶：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115、118-119。

²³ 羅氏認為錢謙益的《列朝詩集》有此具體表徵。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頁90-93。

²⁴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4927。

²⁵ 田汝成所編纂的《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堪稱第一部以西湖為主題的專志，名勝之外更有歷史典故與作品文章，更是退職官員以文化人身分，悠遊於出版商業市場的人物例證。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013年12月)，頁102-103、127。

政府〉、〈錢塘門〉兩作則仿杜甫三吏三別，以描摹動盪社會不穩定隱憂為主旨；餘下末兩作：〈西湖題小桃王氏別館〉一作以多重春景描摹友人別館，至於〈月夜即席示座客〉一作為宴會與友人勸飲之酬作，具即席創作特質，錢謙益對田藝衡的經營由傳記的瀟灑到各種選詩風格的全面性，對田氏的關照不可謂不全面。

較之錢氏多面經營，朱彝尊卻選擇忽視田藝衡的這些特質，或更甚可推論，記載此人的目的並非其詩藝或傳記上的價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靜志居詩話》雖有田汝成卻全然沒有討論田藝衡，《明詩綜》對其傳記描述也精簡地僅一句：「藝衡字子秬，錢唐(塘)人。汝成子。以歲貢為休寧教諭。有《留青日札》。」²⁶選詩僅〈月夜即席示座客〉一首。從選詩的層面來看，捨去了山林、邊塞，乃至於社會地景之寫實的詩人多種特質，反而留下了錢謙益 9 首中敬陪末座的宴籌即席作，大幅消減田藝衡的多面與重要性，至此不禁令人懷疑朱彝尊操作此人之必要，而就傳記層面來看，不同於錢謙益所述的「晚歲以貢，博士罷歸」改為「以歲貢為休寧教諭」，若核對《萬曆錢塘縣志》對田藝衡的記載便能發現恐是錢謙益有所疏漏。方志內容如下：

田藝衡，字子秬，汝成子。以貢教授應天。博學善屬文，自弱冠以詩賦著聲。海內名公爭交驩焉。所著前後正續集數十卷，雜著數十種，多聞好奇，世以比之成都楊慎。為人高曠磊落不可羈縻，至老愈豪，朱衣白髮，挾兩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其座，酬倡斗酒百篇，人擬為謫仙。²⁷

田藝衡在地方的記憶中，是名博學多聞且天下爭交的海內名士，著作頗豐的部分並未受到錢、朱二人的關注，較之《列朝詩集》，方志裡的田氏山水徜徉的個人特質較弱，卻有著晚年狹女遊歷，好客喜酬唱的外向性格。這條記憶敘述倒是被錢謙益給承繼了下來，雖無法排除地方對耆老文人的過譽可能，但無論是四海名士還是詩人身分，都沒有得到朱彝尊的青睞，權可推論朱氏關注並強調的是：他貢授「休寧教諭」的身分被縣志誤傳，且錢謙益甚且誤用為「新安博士」的勘誤意義上，除此之外他並不特重田藝衡此人。

上述例證足徵三層訊息：其一，相較單純以「傳」的史家記述，含括文學特質後「足徵之人」的彈性就增加了不少；其二，被記憶者的彈性擴大，個人特質中的「出身」也容易被強化、關注，成為地方詩選後輩的前沿軌道；其三，若重新以此觀察錢謙益與朱彝尊，便會明顯覺察在模糊的灰色空間中，文學不僅開啟了詮釋空間，更追加了新的競逐路線。錢、朱二人對同一個案的不同態度，足可見到兩種全然不同的訴說口語，錢謙益與地方鄉里強化連結；朱彝尊則去除此種特性，形塑中性、有意識地表現不同於前者的評論立場。下節在兩人語調與立場有此區分的認識上，重新檢視針對單一地域，兩人選人的側重與具備的質地傾向。

²⁶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 3112。

²⁷ (明)顧振宇纂修：《萬曆錢塘縣志》(明萬曆三十七年修，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48 冊，新文豐出版社，1988 年)，頁 21b-22a(頁 811)。而後續《康熙錢塘縣志》之敘述亦基本遵照萬曆本修正，與錢謙益之訊息有不少疊合處，錢氏應是以此本為底本。(清)魏嶠修；裘璉等纂：《康熙錢塘縣志》卷之 22 人物文苑(南京：江蘇古籍出版，1996 年)，頁 8b(頁 413)。

肆、多樣的被拔者與多元的價值觀

吳中文化研究先進羅時進提及：「地域特質的考察，應從其地方、人物、文化三者著手。」²⁸但具體該從三者中的何者入手，又當以什麼樣的形式重建其景貌？本文以為，對人的記憶正可視為最小認知單位，透過《列朝詩集》、《明詩綜》便能追索當時的群體想像。且，兩作在談論故鄉時多以「吳中」為地方感知進行書寫，在錢氏的引入與朱氏樹立的詩、史互繫形式所產生的空間，便可說是為地方意識留下繼承的引頭。²⁹本節希望透過錢、朱二人談論、認知的「吳風」人物特質進行檢視，並聚焦後之承繼者取用的軌跡。

一、選詩者的吳中想像

所謂的「詩壇」正存在於選詩者的想像中，人物活躍其中的方法殊異，同時也組構蘇州地區的部分特質，譬如《明詩綜》中張世偉條目的敘述：

張世偉，字異度，吳縣人。……異度藉甚詩名，庸庸絕少高調。
 〈居園卽事〉云：「牆東堪避世，新卜野人居。巷隘難旋馬，池寬好種魚。閒情雲澹處，爽氣露零初。但解蓬蒿趣，窮愁可著書。」³⁰

張世偉沒有官職，也非特定群體中的活躍人物，朱彝尊則另闢認同價值，稱其別負詩名並以他的詩作〈居園卽事〉作為隱居形象上的補述，詩作人物的低物欲暗示他創作的特質。但既然有詩名便表示主人具有聲名，所著之書得傳其人，不僅暗示詩壇的接受與認可，本人更在詩選中被塑造成一名低調自溺的詩人。文藝是種特質，更是錢、朱二人均相當重視的價值，但《列朝詩集》、《明詩綜》中仍有許多詩、聲、功等三名均沒沒無聞，卻被特意強調的對象。以錢謙益來說，他的選詩具濃厚地方人際連結感，圈選同時亦容易連結他與這些人物間的關係為何，回憶成為他與地方連結的樞紐，並有明顯的地方性特質。譬如《列朝詩集》中的倪學鉅(生卒年不詳，選詩 5 首)之條目：

鉅，字偉長，常熟人。以句讀為童子師，時時依人遠遊，足跡幾遍天下。萬曆丁未，客滇南，遇阿克之亂，間關萬里，獨身得歸。著《滇南紀亂錄》。老而益貧，衣冠藍縷，彳亍行里中，足不知避坎窞，終不肯屈折下人。今年過余，余止之飯，放箸而歎曰：「此中飽糠覈久矣，今日驟享肉味，殆過分也。」病痢數

²⁸ 此說參自羅時進：《海虞詩苑海虞詩苑續編·總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2。

²⁹ 追隨者王應奎(1683-1759)，蘇州常熟人，他所編纂的《海虞詩苑》便是既以地方為關懷範疇，同時又以錢謙益《列朝詩集》作為師法對象的實例。王應奎將「吾虞」視為重要的文學核心，而他無疑是錢氏的讀者，亦是虞山詩派精神的保留者，他期許自己能傳承海虞文風而有《海虞詩苑》的編纂之作，形成讀者接受作者精神後另起編纂的延續代表。王應奎成書未竟而亡著實遺憾，但也因此有道光年間藏書家瞿紹基(1772-1836)的《續海虞詩苑》，更有嘉道年間單學傳續此脈絡而成書的《海虞詩話》，延續了以此種編纂方式為主軸的可探性。再次證明了地方鄉前輩的影響力，亦提供新的地方研究向度。

³⁰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70，頁 3500-3501。

日而卒。勤苦好學，所著有《補韻府群玉》、《廣蒙求》、《經鉅堂》、《結繩》、《蟲仁》等書數百卷，以貧故，輒為人取去。³¹

倪鉅雖只是名地方童蒙師，卻有歷經雲南動亂平安生還的經歷，勤奮著書，讓錢氏印象深刻。他晚年落魄、貧不能立，卻不曾求助於他人。錢謙益與倪鉅的連結在宴請一名潦倒之人中揭開，且在死後一一記載他的書目，除此之外詩選之作，更為此形象進行補充。〈避兵丁未臘月十五避阿克之亂〉描述詩人遭逢亂世不得歸鄉的感觸；〈鬼方道中二首〉中的詩人因貧賤為人所輕，但因走過兵燹的敘述，也引領讀者一同認知亂世之本質。整體選詩均圍繞在詩人的特殊經歷與老去的最後形象，襯托傳記中的「學究」形象。

地方老學究的被記載與其說是為文藝，不如視為彰顯地方人物特性。若再探倪鉅在《列朝詩集》後開始進入方志記載的脈絡，便能略窺錢謙益開展的人物形象對地方記憶的影響。³²換句話說，詩、史互繫帶來的鬆動詮釋空間，與選詩者有意的地方感連結，開啟了多元化的人物記載可能，而這樣的影響同時反映在努力走出不同於錢謙益理念的朱彝尊身上。朱彝尊雖不將倪鉅視為足徵之人，但對具有地方特質的文人亦有所載錄，譬如僅錄「民謠」詩 3 首的欽叔陽：

欽叔陽，字遇公，吳縣學生，入國子監。有集。太監孫隆以督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額，惡少年行賄充委官，乘輿張蓋，勒索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眾二千人，分作六隊……。知長洲縣事鄧雲霄，見民情洶湧，擒委官頭目，械於元妙觀，眾立毆死，裂其尸，知府朱燮元勸諭，始得解散，此萬曆二十九年事也。時葛成慷慨就獄，後得宥罪。……遇公謠凡一十三首，茲錄稅官謠三首，其一云：「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阡陌殫為河。殺禾殺麥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蓋音節特近古者。³³

欽叔陽僅是名國子監生，朱彝尊對此人的敘述也非以人物為唯一核心，雖稱此人「有集」卻沒記載，對他摘錄的作品僅下：「蓋音節特近古者」稍加讚許而已，顯然他值得被記憶的環節是在傳記的「事」功上：崑山絲織工葛成(1568-1630)³⁴率眾抗爭超徵稅額的事件。欽叔陽的功績在於與民一起，用文學表達民怨、歌謠號召支持。與此之後，朱彝尊刻意提及 20 年後蘇州民眾抗爭，大有埋下伏筆的態勢。

上則述及的顏佩韋(?-1626)其人，也被以近似「以詩錄人」的手法載於周順昌(1584-1626)條目之下。³⁵朱彝尊對周氏的選詩僅錄 2 首，傳記上的記載亦聚焦他因得罪魏黨從容赴死的情

³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 5554-5555。

³² 目前可見倪鉅的方志記載者二：康熙年間錢陸燦所纂之版本，將倪鉅的詩作作為地方風土的補述，但並未將之選入藝文。然而，光緒年間龐鴻文的版本不僅將之收入人物志之文學類，更將記亂的《滇南紀亂錄》收入代表地方藝文的項目中，足見完整化的進程。(清)高士鶴修；錢陸燦纂：《常熟縣志·文苑傳》26 卷(康熙)卷之 2。清康熙 26 年(1687)刻本，頁 6b。(清)鄭鍾祥修；龐鴻文纂：《常昭合志稿》48 卷(光緒)卷之 30。清光緒 30 年刊本。

³³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63，頁 3167-3168。

³⁴ 吳奈夫：〈關於葛成領導的蘇州織工鬥爭〉，《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 年，頁 18。

³⁵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60，頁 3047-3048。

景，但朱氏筆墨強化者，反是蘇州群眾如何替周伸張正義，與其中五名義民被判有罪的過程。五名義民中，顏佩韋在死前自我明志，更被具有復社背景的張溥(1602-1641)立碑紀錄，³⁶值得檢省的是，朱彝尊記載此事件時多談了張溥為人構陷時，有五人杖劍為他顯靈的軼事傳聞。雖為傳聞，但在接觸到張溥後人的朱彝尊眼中，整起事件既具正義與天道的正當性，後之來者如朱氏也在敘述周順昌與正義中，將自己連結在地方義士群像中。

以朱彝尊特記張溥之子的血書，與朱替其跋尾的細節來看，他同樣希望與自己的選詩世界具有連結，並強化自己為「史」的參與者，在詩與史之間，地方人物的共同特質經常是強調詩藝創作上的成就的：士民連結、「吳中甲第之盛」³⁷、博覽群書、特殊閱歷，與不凡的識見印象等。³⁸詩或許「非其所長」或「詩非所務」，但這些地方人物均有為學特出，並因此有遠大識見的特性。是以特性的呈現，有賴存詩、存人的共同結合，《明詩綜》表述的是以側面文藝角度詮釋的歷史，同時，也在紀傳體形式上留下影響。

二、被彰顯者的表述與特質

吳中地區的核心本質，是由親族、師承、友朋等人脈網絡結構而成，詩壇背後的文藝群體也因為這長久的穩定傳承，而有繁茂的多樣性。³⁹錢、朱二人圈選之人多有群體連結上的表徵，以此，本節專論錢、朱二人給予極高評價的人物，這些在「詩」創作上被圈出來的蘇州人物，不僅風格可表徵地方特質，同時更可透過兩名選詩者的視角，聚焦特殊人物。

首先是與錢謙益關係匪淺的親族之人錢謙貞，以選詩者的角度來說，錢氏顯然處於私情與審美界線均相對模糊的情況，從他對關係親近，又默默無聞的吳地詩人的特意提取，反能呈顯出他與「地方」鄉里連結感強烈的特質。《列朝詩集·錢秀才謙貞》：

錢秀才謙貞二十八首

謙貞，字履之，從祖祖父副使春池公之孫也。幼失祖父，母徐守節自誓。先君宮保公翼而長之，故履之雖從祖弟，猶吾弟也。生而韶令，有雋才，起於孤童，

³⁶ (明)張溥：〈五人墓碑記〉，崇禎年間。收錄於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頁220-221。

³⁷ 陳仁錫(1581-1636)條目中對於人物「詩非所務」但老於公車，且掛一併舉數人，以稱「吳中甲第之盛」人才濟濟的意圖更為明顯，陳仁錫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祭酒，可見得此人經學涵養受到國家正式認可，傳記不僅寫此人，而是將長洲地方在科場上博得盛譽的人等，以關係鍊方式逐一帶出。(清)朱彝尊：《明詩綜》卷66，頁3294-3295。

³⁸ 徐允祿(生卒年不詳)條目中則指稱雖「詩非所長」，但對徐氏能精準預言國家將傾，懇請及早遷都的先見之明有著極高的評價(清)朱彝尊：《明詩綜》卷65，頁3275-3276。

³⁹ 入清後蘇州方志在眾多藝文門類中，有刻意彰顯、強調以「詩」作為藝文領導的現象，可更高層級的《蘇州府志》反將「書畫」視為該地特質。同治年間的《重修蘇州府志》的編排次序上，藝術先於藝文，藝術領頭掛帥者即為「書畫」門類，寫詩並未受到單一門類性的重視。且就詳細程度而論，個人詩集雖整理於「藝文」門類的人名之後，但不同於書畫門類每人立傳，簡略許多。(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重修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1991年)，109卷頁1a、136卷頁1a。若談及蘇州一大代表的書畫，史美德(Mette Siggstedt)認為明中期的蘇州就有穩定的世族文化傳承，地區山水於其中便有著「在地認同」。(瑞典)史美德(Mette Siggstedt)：〈明中期蘇州地區的地誌題材：一個圖意學的揭露〉(收錄於張璋真等：《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年)，頁229-231。

能自鋌礪。早謝舉子業，讀書求志，闢懷古堂以奉母。簾戶親深，書籤錯列，所與遊惟魏冲叔子、馮舒已蒼，相與論詩度曲，移日永夕，下鍵謝客，意泊如也。⁴⁰

錢氏面對與自己一同長成的族弟，除生養背景的細節外，可發現諸多特質與前之何允泓「布衣」身分頗有疊合，科場之外展開的創作生命，與維繫自己心志意向上的實踐，成為受錢謙益青睞的詩人，而吳中詩人群體也反映了這項質地。但往下，錢謙益更透過外人，闡明錢謙貞的價值：

中歲攻詩，不屑應酬俗調。友人程孟陽精於論詩，少所許可，獨稱履之之詩，以為鮮妍和雅，妙得近體之法。年五十餘，遭世亂，坎壈不得志而卒。其孤孫保，能讀父書，捧遺編泣曰：「請附選集之後，以有傳也。」元裕之撰《中州集》，錄其兄敏之之詩於末簡，人不以為私。余不敢以群從私履之，而推孟陽之緒言，以存履之，亦履之之志也。⁴¹

錢謙貞中年才開始正式學詩，創作上沒有流於主流調性，對於錢謙貞值得記載的特質，錢謙益並不明說，但此避嫌實具層次上的安排。他首先抬出吳中詩壇前輩程孟陽的正面評價，以外人之評語來強調錢謙貞能有不媚俗、具雅正風采的優良特質，中夾錢謙貞之子的親情懇託，後再反將品評權柄輕移程孟陽，以程的正評為其留傳。錢謙益或許塑造了表面的中立，實則非常精巧地處理了一名位處偏私的人物，亦是選詩者立足於地方的案例。這樣的人情網絡與瓜葛，正是吳中蘇州以己親己師友為命的正常向度。簡錦松對此種傾向認為《列朝詩集》本身便具有彰表吳中傳統可作為詩壇代表的企圖，⁴²本文以為這樣的傾向不僅明白，更替後之為地方選詩、為史傳的各方來者留下參照效仿的軌跡。

相比之下，朱彝尊雖不若錢謙益牽絲帶瓜地將鄉里人物稱論評比，較之牽涉到社會或歷史事件人物傳記譬如前文欽叔陽之例的諸多細節，但他面對詩藝高超的傳主時，往往選擇精簡操作，下舉其心目中表徵蘇州詩壇的人物詩傳結合。袁年(生卒年不詳)《明詩綜·袁年》錄詩僅4首，其傳記條目如下：

袁年，字子壽，吳縣人。萬歷庚辰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青州府，遷江西按察副使，轉雲南參政。有《觀槿齋集》。子壽五言雖少精詣，不墜胥臺家法。⁴³

朱彝尊對人的記憶多半直指此人的直接成就，袁年進士及第，堪稱國家認可的人才，接著細數重要的職官歷練。乍讀之下容易使人有文藝僅聊備一格的感覺，但傳記之餘的詩作主題選擇卻隱藏了一般地方志詳細傳記都做不到的補述。是以在析解朱彝尊人物記載材料的取捨前，

⁴⁰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5548-5554。

⁴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5548-5554。

⁴²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頁20-21。

⁴³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53，頁2700-2701。

首先可比對地方志書上的記憶，袁年最早出現於崇禎年間的《吳縣志》，其條目如下：

袁年，字子壽，褒子繇縣學生，應穆廟登極，恩選萬曆丙子丁丑聯舉。念祖竄春秋高亟，歸省至庚辰，殿試授南京武庫主事，提督武學，程課勳胄子弟維嚴，轉職方郎中，綜核軍伍，絕不籋廬。其職陞青州知府。值蝗旱，民多流移，年貯穀，施賑散者歸耕，州縣歲額，正供徑給批解司免入府庫，年以潔已，帥屬省民耗羨節，屋歡歌滿。擢江西副使，分巡臨袁繕甲增陴陬楚粵門戶之險。俄晉雲南參政，威懾土司，默消隱禍。績方懋而志，耽林壑有疏，乞休遂致仕。所著有《金碧》等集。鄒元標志略。⁴⁴

《吳縣志》在敘述袁年的生平時，亦採用職官晉升的方式刻劃一個人對國家的功績，在南京能督導貴胄子弟、在青州能領導民眾度過天災，並依靠身體力行的風範收攏民心。即至外派邊疆也能與地方土司取得平衡，最後順利致仕。可由此反思人物歷程，袁年全然是名深為朝廷倚重的要員，沒有地區特質也沒有明顯的故鄉傾向，雖近乎完滿卻不具特質性。反觀《明詩綜》要如何以詩作表述：「不墜胥臺家法」句，則可從袁年被錄之 4 首詩作所展露之面向來論。詩作順序：〈白水道中〉：驅車見山勢，登高思人之際遇，亦即為官人臣者常有的自我遣懷，緊接〈荊江感懷〉卻疊出不同於「致仕歸隱」的壯志：

浩浩荊江流，要渺望不極。風雲倏回翔，日月自出沒。勢合巫峽通，地分吳楚圻。啟不稱天險，中原非所亟。吳蜀多英雄，交爭遂相迫。豺虎白晝噪，吞噬安所惜。烈士負孤忠，震怒天為戚。千載垂芳聲，至今有餘赫。臨流惻愴滋，涕泗霑巾幘。⁴⁵

以山川江流興發吳、蜀古人中的忠臣烈士之感懷，巫峽山水記憶千古吳、楚之爭，詩人特意在「中原非所亟」句將此地與中原區別「吳楚」之後則是「吳蜀」，地域間的歷史糾葛亦成為英傑傾軋的舞臺。而詩作末兩聯，敘述者感觸的抒發情聲則更形明顯，他信仰著孤臣烈士的付出，實是將「吳」的傳統置入此大脈絡中，繼而朱彝尊下收之〈豫讓祠〉則以智伯（？—前 453）之死與豫讓（—約前 445 年）的自毀復仇之路檢省國恩，並斥責二心之人。此作在《靜志居詩話》別受矚目將之置於第一首，⁴⁶呼應朱彝尊特為看重對歷史公義價值的肯定立場，但這應不能全解所謂的胥臺家法。末所收之〈雨宿一雲寺〉一首如下：

蠟屐候新晴，攜尊陟西嶺。松間聒濤聲，樹杪掛瀑影。雲起日欲晡，雨來山亦暝。徑窄怯筇躋，林寒覺衣冷。言投方外居，因嘗雨前茗。堂懸燈一粟，門擁墨千頃。鳴禽寫幽泉，頓使萬慮屏。⁴⁷

⁴⁴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50 卷(崇禎)吳縣志卷之四十五，明崇禎刻本。

⁴⁵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53，頁 2700。

⁴⁶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 453。

⁴⁷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53，頁 2701。

詩人轉入山林，聽松聆瀑，並以內斂的心緒感知行途上的遭遇與自身，境遇冷了便往方外而去，那盞堂前掛起的一粟孤燈，立於浩渺山巒中雖顯微小，門後詩人卻坐擁書海，逐日墨耕。可惜的是袁年詩作缺乏繫年，不能確知此四首是否均是袁年致仕後之作品，但自〈白水道中〉的地位省思、〈荊江感懷〉詩人表徵出的浩瀚壯志，與吳地英雄自許的胸襟，下收討論國恩難報的〈豫讓祠〉，末結退隱主題的〈與宿一雲寺〉等面相，或是朱氏刻意將傳記縮減，僅以詩作的編排細節表徵袁年的設計，就像在引導讀者走過朱彝尊想像的袁年的生命特質一般，預設讀者的閱讀順序，以鋪排詩作，使其闡釋傳記所不能為的個人特質。進而「胥臺家法」的釋義，袁年此人表徵「出世為天下」、具「吳地認同」、對「歷史古典的熟稔」，或正可解為朱彝尊認可的吳中詩人特質。而這些詩作延伸展現的詩人隱遁山林之一景，也正是《吳縣志·袁年》條目的末尾記載：「績方懋而志，耽林壑有疏，乞休遂致仕。」⁴⁸那種宦績圓滿，游走山川林壑的高人之結局與高度，從精簡傳記不易傳達卻在選詩中呈顯，可說依循典故對人物的記載，同時也替「知詩者」留下軌跡，展現人物特質與側面。

是以，編選者刻意樹立的語調與形象，一方面在形式鬆動的彈性下有了許多選人取材上的可操作性，讓整體史傳有著詩作的補述，同時又在兩人分別對人物、地方的牽繫下，留下更多人物被取材的可能，兩作形式上帶來的鬆動空間，留下人情或性情表徵，人物因此面向更多、可載彈性也更高。往下可再行探討的是，編選是否形成承繼上的傳統，與對地域產生的可能影響。

伍、編選的地域傾向

錢謙益、朱彝尊兩人描摹的人與詩，可說同時將選詩者身分上的複雜性引導而出，然則兩人同樣身為選詩者、詩評家，也都與吳中地域有緊密聯繫，以此兩人在詩、史互繫形式上的具體牽繫，以及與地域間的關係可說成層相疊。蔣寅討論朱彝尊與錢謙益在詩選上的關係時認為，因襲多有，或許傳記還不如錢氏詳確，但朱彝尊對於保留地方文獻下的蒐羅功夫，恐非錢所能及，是以比較中展現詩史上的研究價值。但本文以為不僅在文學上的影響，史料傳記的影響也是可以探討的。⁴⁹首先，錢謙益光是身為形式導入的先行者朱彝尊便難忽視，若將兩人的「吳中」人物對等觀看，便能發現其中不乏朱氏並不認同卻仍收錄的人物，只因錢謙益曾經提及，他為了勘誤《列朝詩集》不惜記載己所不認同者。

次而，在處理吳中、蘇州此等對二人均顯親近的地區時，談論的方式便有顯著差異，錢氏如鄉里耆老重人之側寫，寫的是人情；朱氏則重其史事，將敘述置於因果洪流，古今串聯。這是「地域參與者」身分上的不同企圖。

其三，被錢、朱兩人稱許處理的吳中人物，常被後之來者放大與取用，透過對此過程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梳理地方特質的產生過程，這是「影響來者」的層面。⁵⁰

⁴⁸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50卷(崇禎)吳縣志卷之45，明崇禎刻本。

⁴⁹ 蔣寅：〈朱彝尊的明詩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5卷第5期，2008年，頁79、82。

⁵⁰ 關於朱氏對錢氏所選之人的刻意討論，請參本文註45之補述，頁14；錢氏的「耆老人情」特質，請參本文：「倪學究鉅」，頁7、「錢秀才謙貞」，頁9-10等條目之語調特質辨析；朱氏「史傳側重」特質，

是以，針對第一層面：選詩者身分錢、朱二人分別的出發點，可自清代人如何接受二人開始理解。《四庫全書總目》對《明詩綜》的記載對此留下不少線索，也成為目前對此二人研究的基本認識：

《明詩綜》一百卷通行本

國朝朱彝尊編，彝尊有《經義考》已著錄明之詩派始終三變。……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⁵¹

《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明人的認識著重在朱彝尊之論：「人群相互偏袒與擁護」，逐漸形成晚明派系群立的局面。對此詩學審美已然不純，黨同伐異產生的負面影響甚被定義為誤國之音，錢謙益便被視為此負面風氣代表。清人多在此認識下點出《列朝詩集》挾帶私情，視為多違事實。加之，錢謙益在離世百多年後(1769)，其作品遭到乾隆帝(1711-1799)的嚴厲禁燬，⁵²《四庫全書總目》對錢氏的負面批判並不讓人意外。但若退幾步檢視此番對《列朝詩集》的批評，便能發現選詩、立傳的作品儼然進入大是大非的道德層面，足可見到此編選形式產生的影響效度。後文以此為階，對《明詩綜》投以正評：

彝尊因衆情之弗，協乃編纂此書，以糾其謬。每人皆略敘始末，不橫牽他事，巧肆譏彈。里貫之下，各備載諸家評論，而以所作《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不盡出於標榜其所評品，亦頗持平於舊人私憎私愛之談，往往多所匡正。六十年以來，謙益之書久已漸減無遺，而彝尊此編獨為詩家所傳誦，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⁵³

上之敘述將《明詩綜》定為歸正謬誤的編選之作，項目大致三點：第一，不牽扯「他事」、第二，引入他人評論、第三，自我品評有所節制，即便對親近之舊人亦如是，並稱呼就是此匡正之作使得《列朝詩集》逐漸消失於時間的長河之中。此三點確實可作為朱彝尊與錢謙益在同樣形式操作下應該觀察、聚焦的差異，但在敘述與地位上是否真是取代關係則可重新檢視。諸如兩作均有選入的唐時升(1551-1636)⁵⁴便是一例，《列朝詩集》中的傳記內容如下：

本文論於：「欽叔陽」條目，朱彝尊隱將史傳道德功能操作於其中，頁 8；至於為後世放大取用之例證，請參本文陸燦編寫《常熟縣志》時放大取用的「何允泓」條目，頁 4-5。

⁵¹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90 集部總集類 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7a-28b(頁 5-105 至 5-106)。

⁵² 孫康宜在〈錢謙益的歷史定位〉一文中點出禁燬對錢謙益歷史評價的影響，並提及研究明清之際人物多應具有多層次並回到歷史現場的意識，多有觸發。孫康宜：〈錢謙益的歷史定位〉(<https://goo.gl/YrNhOX>)，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但本文主旨為探討錢謙益對虞山地方詩學編纂的影響，並不在「遺民」與「貳臣」等歷史認等議題上多作討論。

⁵³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90 集部總集類 5，頁 28a-28b(頁 5-106)。

⁵⁴ 唐時升以「布衣」身分參與過萬曆年間《嘉定縣志》的纂修，應可視為地方上受到認可的讀書人。(明)韓浚修；張應武纂：《嘉定縣志》22 卷(萬曆)卷之二十，明萬曆刻本。

唐處士時升一百七首

時升，字叔達，嘉定人。少有異才，未三十謝去舉子業，讀書汲古。……叔達私議，某得某失，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若數一二。東西構兵萬里外，羽書旁午，獨逆斷其情形虛實，將帥成敗，已而果然。辰玉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事，固有類此者，竊意之耳。」……余未幾罪廢，不克副其望，而叔達之窮老憂國為何如也！叔達為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之略。……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用方寸紙雜寫如塗鴉，旋即棄去。遇其得意，才情飆發，雖苦吟腐毫之士，無以加也。……四明謝三賓為令，合孟陽、子柔、長蘅之詩文，鏤版行世，曰：《嘉定四先生集》，而余為之序。⁵⁵

錢謙益以熟悉此人如隔村老友的鄉里語調談論唐時升，從志向到言談細節都能娓娓道來，但整則傳記最顯著的，卻是他對於整體國家大事、戰爭細節都能預料的本事，這樣的能力錢謙益向來看重，且多半歸因於多讀書，熟知古人事。論完人格、特質，錢不忘再次抒發自己如今的境況與之連結，此習慣儼然是錢氏參與傳記的方式。最後，錢謙益論及唐時升創作上的瀟灑形象，牽引更多相關人物，將錢謙益非常看重的嘉定四君子引入視野。面對此局面，朱彝尊對諸多細節均有取捨，《明詩綜》對唐時升的記載如下：

唐時升十首

字叔達，嘉定人。有《三易齋集》。「嘉定四先生」詩文，要當推叔達第一，長蘅子柔且遜席，矧孟陽乎？錢氏謂其「放筆而成」，繹其辭，乃追而出者。由其欲伸孟陽，故有意抑之爾。[附錄]愚山云：「叔達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遇其得意，才情飆發，雖苦吟腐毫之士，無以加也。其文縱橫踔厲，深惡艱深塗澤之作，自命其集曰《三易》。四明謝三賓知縣事，合孟陽、子柔、長蘅之詩文，鏤板行世，題曰：《嘉定四先生集》。⁵⁶

「矧孟陽乎？」朱彝尊承認唐時升的方式，是率先駁斥錢謙益在嘉定四君子中首重程孟陽的私心，附錄特取「愚山」⁵⁷之語進行傳記補述，但就其批評基本都與錢謙益的敘述相疊合來看，朱彝尊的目的是想藉更早前輩的評點來指出《列朝詩集》中的見解不一定出於錢謙益，並暗示能批評明代詩人者，也非錢氏一人可以獨專。若以此例子檢視朱彝尊，其撰述方向不僅止於勘誤還易朝批判錢氏強化操作，《明詩綜》中不時有為批評、勘誤錢謙益而選錄但朱本人卻不

⁵⁵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下》，頁 5433-5434。

⁵⁶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 65，頁 3251-3252。

⁵⁷ 此處之「愚山」者，筆者初時認為是素與朱彝尊交好的施潤章(1618-1683，字愚山)，但《明詩綜》中另一段署名愚山的附錄讓筆者懷疑非施潤章。該附錄云：「天啓辛酉，予官詹端，汝廉已書累萬言……」(《明詩綜》卷 65，頁 3275)天啓年間(1621-1627)施潤章年紀尚幼，不可能是名正式官員，目前待查此愚山為何愚山。但退幾步認知此段敘述，能在天啓年間為詹事官的敘述者，無論官場、詩壇都可算是錢謙益、朱彝尊二人之前輩，為朱彝尊取之，至少可視作取擇前輩之語、訴諸權威的操作。

特欣賞之人物，⁵⁸在「匡正」上或許確實如《四庫》館臣所言，他挑出了錢氏的疏漏、流於人情的毛病，但只為勘誤而行傳記與錄詩，實有失一代詩集編纂之氣度。至於《明詩綜》是否壓縮《列朝詩集》在文藝、史學撰述上的接受則更不然，譬如後世嘉慶年間《直隸太倉州志》對唐時升的條目：

唐時升，字叔達。父欽堯，字道虔。事母孝，與弱弟友愛，為人倜儻，多大畧。學瞻氣豪，由貢生選撫州訓導，未任卒。時升少有異才，年未三十謝去舉子業，讀書汲古，志大而論高。嘗以李德裕自期。王錫爵執政時，升偕其子衡讀書縱論天下事，凡兵農、錢穀具言始終、沿革。時東西構兵萬里外，羽書旁午，獨逆料，情形無不奇中。衡問何以知之？時升曰：「吾觀古人事，固有類此者，竊意之耳。」詩才雄健，古文師法歸有光、知縣謝三實。合婁子柔、李長蘅、程孟陽詩文，刊之號《嘉定四君集》。⁵⁹

《列朝詩集》將唐時升的鄉里細節保留了下來，不慕舉子業灑脫的一面也是，因讀萬卷書而能預知萬里外兵事的識見軼聞更被留下了。由此便能發現後之來者，尤其是人物所屬的「地方」史傳，在認同感驅使下並不全然倒向明顯更「正確」的朱彝尊，錢猶如親臨的人情細節對地方情感需求來說恐怕更具吸引力。地方志此類非純為文藝服務者，對錢、朱二作的取用一面是訴諸權威，另一面亦可說是帶給本來就對人、地情感有密切需求的地方志更多操作的空間，是以能見錢、朱二人在詩、史互繫的前提下，與對地域熟悉的諸多細節中不僅是品評權柄者，更因隱性的地域關係者，形塑了更多文學與史學交相影響的環節。

陸、結語

本文就《列朝詩集》、《明詩綜》兩部結合詩、史的編選之作為出發，由統計發現其對吳中之偏向，並一面重新檢視此形式在兩作中具體造成的效果，也自例證中討論文學視域中向來僅處於補述地位的地方史料，如何與兩作產生交互作用。無論是可能的參照、具體造成的影響與後之來者如何接受，都該是審視詩、史關係的最直接方法。同時，也放大檢視錢、朱二人本身在地域、地方上的身分複雜性，在鄉前輩的條件上視二人為「郡邑詩話」⁶⁰濫觴，觀察這樣的

⁵⁸ 譬如《列朝詩集》中的沈野(丁集第14, 頁5693),《明詩綜》也選錄(卷65, 頁3270-3271),對於一個「布衣」兩人都有條載。錢氏刻意強調一名布衣的文藝、狂生樣貌,收其詩作187首,並對其讚譽。但放在朱氏,不僅只收錄4首,並在沈氏聞名在外的詩句引注更早前的前人詩句,評此詩作為:「前人久已道之矣」批評中大有解構其重要性的企圖,這種刻意記載只為反駁《列朝詩集》的條目,展露朱彝尊不認同卻無法無視錢謙益的一面。

⁵⁹ (清)王昶纂修:《直隸太倉州志》65卷(嘉慶)卷之三十七。清嘉慶7年(1802)刻本,頁6b-7a。

⁶⁰ 地方詩話、郡邑詩話、區域詩話……等圈選地方作為討論範疇的詩話之發軔,一說為明代萬曆年間的《豫章詩話》一作,但真正將此形式精確發揚的時間區段,直可說是至入清後才開展而來。倪晉波、余志敏:〈桑梓風雅、地方詩史與國家政教—論清代江蘇郡邑詩話的價值變奏〉,《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1期,2018年1月,頁46-47。在各種地方詩話的名詞類別定義中,因認同蔣寅仍兼顧行政劃分區塊的認知,本文取用其說將此名稱定義為「郡邑詩話」。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2003年,頁174-175。遇到詩派定義問題的研究者所在多有,譬如孫立在《明末清初詩論研究》中論及錢謙益及其詩友門生時,隱隱覺察「虞山詩派」的範疇並不明

形式創建留下的空間，與早期史料逐漸產生的影響，進而有機會觀察形式帶來的詮釋空間，是否真確對人地關係的連結產生正面影響。不管是錢謙益不忘將自己如今的身世感觸附加於記載中，使自己與親近之人相互結，讓己身與人物、地方產生進一步連結，還是朱彝尊企圖用史家公秉的語調，於地方人際連結網絡中，將成書過程牽繫在重要地方史事之後，都能見到兩書關係之深刻。是以，更應該重視可能對逐漸繁茂、成熟的地方自我文藝建構體系，與詩話批評的影響向度。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朱彝尊是錢謙益的取代者，可就本文實際觀來朱氏既無法放下錢氏的「謬誤」，更沒有造成《列朝詩集》的被遺忘。《列朝詩集》的具體成就不僅僅是詩、史互繫傳統的承繼者，更是追隨此形式的方志與「郡邑詩話」在《列朝詩集》有疏漏人物時的重要參照者，勘誤之後成為傳統的一環，也暗示人物傳記儼然形成另一種可被探索的、各地傳統之形成的可能向度。本文雖在有限的時間精力與篇幅下，還無以照顧後之來者如何接受此傳統，但由鬆動的間隙與各自豎立山頭的細節，均已見其端，而這些都需要進一步聚焦在特定空間下產生的文本，與相關人物調查後才能驗證，亦是地域、地方研究尚待開發的未來項目。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 1.(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2.(明)張溥：〈五人墓碑記〉，崇禎年間。收錄於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
- 3.(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50卷(崇禎)吳縣志卷之四十五，明崇禎刻本。
- 4.(明)韓浚修；張應武纂：《嘉定縣志》22卷(萬曆)卷之二十，明萬曆刻本。
- 5.(明)顧振宇纂修：《萬曆錢塘縣志》明萬曆37年(1609)修，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第48冊，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
- 6.(清)王昶纂修：《直隸太倉州志》65卷(嘉慶)卷之三十七，嘉慶7年(1802)刻本。
- 7.(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190集部43乾隆武英殿刻本。
- 8.(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儒學出版社，2006年。
- 9.(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10.(清)吳偉業撰；(清)顧師軾附錄：《梅村家藏稿》，景武進董氏新刊本，卷第二十七。
- 11.(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重脩蘄州府志》，南京市：江蘇古籍，1991年。
- 12.(清)高士鶴修；錢陸燦纂：《常熟縣志·文苑傳》26卷，康熙26年(1687)刻本。
- 13.(清)鄭鍾祥修；龐鴻文纂：《常昭合志稿》48卷(光緒)卷之30。
- 14.(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15.(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確。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92。換句話說，對於地方詩派的考慮，除單純以空間串連外，更有找出屬於當時觀看意義上的價值。

- 16.(清)魏嶠修；裘璉等纂：《康熙錢塘縣志》卷之 2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1996 年。

二、現代專書

- 1.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 年。
- 2.(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追憶：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
- 3.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 4.陳廣宏：《閩詩傳統的形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 5.傅璇琮、蔣寅總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北京：人民出版，2010 年。
- 6.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7.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 年。
- 8.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 9.羅時進：《海虞詩苑海虞詩苑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10.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三、學位論文

- 1.尹玲玲：《清人選明詩總集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2 年。
- 2.史哲文：《安徽清詩總集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7 年。
- 3.李清華：《清代地域詩話研究》，上海：上海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6 年。
- 4.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四、期刊論文與網路來源資料

- 1.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
- 2.(瑞典)史美德(Mette Siggstedt)：〈明中期蘇州地區的地誌題材：一個圖意學的揭露〉，收錄於張瑋真等：《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年。
- 3.吳奈夫：〈關於葛成領導的蘇州織工鬥爭〉，《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 年。
- 4.倪晉波、余志敏：〈桑梓風雅、地方詩史與國家政教—論清代江蘇郡邑詩話的價值變奏〉，《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1 期，2018 年 1 月。
- 5.孫康宜：〈錢謙益的歷史定位〉(<https://goo.gl/YrNhOX>)，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 6.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 卷 4 期，2013 年 12 月。

7. 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第 5 期 2003 年。
8. 蔣寅：〈朱彝尊的明詩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5 期，2008 年
9.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鑰》第 2 期 2004 年 7 月。
10. 嚴明：〈吳文化的基本界定〉，《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91 年。

